

英国汉学家霍克思：中国文学的『摆渡人』

□ 李 震

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年），英国汉学家、楚辞学专家、红学专家，是西方世界首部《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和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楚辞》英文全译本的译者。他还翻译出版了《杜诗初阶》、李贺《神弦曲》、韦庄《归国遥》等。通过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作品，霍克思毕生致力于“使中国文学成为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译研并重，探寻《楚辞》的无限魅力。《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不仅承载了战国时期楚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邃的情感表达，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竞相模仿的经典。早在19世纪中叶，《楚辞》就已传播至西方，但多以《离骚》《九歌》的译介为主。1953年，霍克思提交的博士论文《〈楚辞〉的年代与作者》率先打破这种单调局面，“对诗歌词汇、押韵、结构等进行了统计学式的考察”。1959年《楚辞：南方之歌》的问世，标志着西方首部《楚辞》英文全译本诞生，译本不仅准确传递原诗的意思，更在语言的韵律、节奏和意象上做了精心处理，使得译文在形式上与原文相呼应，达到了形神兼备的效果。因此，译本出版后不久，即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丛书：中国系列”。

对于霍克思而言，翻译《楚辞》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索与研究。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文献考据，这突出体现在序言和注释两种副文本上。在长达60多页的序言里，霍克思考察了“辞”的文体特点，特别是如何上承《诗经》、下启汉赋。他还利用翔实的文献、史料和数据，对《楚辞》各篇目作者和创作时间进行重新考证，为学界认知《楚辞》打开了新视野。译本的另一特色是丰富的注释。从天干地支到牛鬼蛇神、从尧舜桀纣到香草美人，霍克思均一一注解，或寥寥数语，或长达几百字，以期尽可能减少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阅读障碍。甚至为了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元素，他还不吝笔墨绘制插图，用视觉化的图像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

1985年，霍克思对译本进行了修订。在进一步文献考据的基础上，对初版中的不妥之处进行了修改、完善和增补。感怀于《楚辞》的无限魅力，霍克思决心要将这部伟大的作品介绍给世界读者，而西方读者也的确从中感受到了《楚辞》所蕴含的瑰丽奇巧的想象、激昂悲壮的情感以及博大精深的哲理。十年锤炼，铸成《红楼梦》全译本。让霍克思名声大噪的是其所译的《红楼梦》。从1970年开始，霍克思花费10年时间翻译《红楼梦》前80回，并分别于1973年、1977年、1980年出版了3卷。最后40回，则在其指导下由女婿闵福德完成翻译。由此，西方世界首部《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得以铸成。译本甫一问世，便广受赞誉，钱锺书、白先勇、宋淇等学贯中西之人，纷纷发声力挺，认为其乃汉译英的经典，甚至被直接选为大学教材。霍克思译本将《红楼梦》从中国推向世界，影响深远。21世纪著名的三部世界文学选《诺顿世界文学选集》《朗文世界文学选集》《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均有收录《红楼梦》译文，且均来自霍克思译本，这既反映了霍克思译本推动《红楼梦》走向世界文学之林的重要贡献，也彰显了霍克思译文的独特魅力。

霍克思谈及如何翻译《红楼梦》时直言，“我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因为这是“由一位伟大作家用血泪写成的，并反复修改的”。曹雪芹那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深深感染了霍克思，促使他潜心钻研。为了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中，霍克思选择辞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因为他对《红楼梦》无限热爱，从中“感到了无穷的乐趣”，决定将这一古典名著的最佳译本带到英语世界。

霍克思“毕十年于一译”，实现了《红楼梦》真实与诗意的异域转化，而这离不开他不厌其烦地修改。从人名的翻译到故事情节发生时序的厘定推断，从韵脚节奏的选择到诗学效果的重构，从意象习语的再现到跨文化的融通，霍克思从着手翻译《红楼梦》伊始，便对自己严苛要求。他不断推敲字词、斟酌语句、体察差异，把不同底本对照甄别，使得译文日臻完善。而化用英语文学经典中的表达，是他

“以经译经”的独特方式。在“宝钗扑蝶”中，霍克思有意增添关于蝴蝶飞舞的描述“fluttering and dancing on the breeze”，此句源自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水仙花》，这无形中提升了《红楼梦》这部诗化小说的诗意效果。如此，霍克思将其最爱的《红楼梦》融入新的文学场域之中，使得异域读者可以迅速领略原文的魅力，进而构建其文学经典地位。

培养后学，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从1953年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系教师开始，霍克思就已经在培养汉学后备人才。无论是在哈佛大学远东系担任客座讲师，还是出任牛津大学汉学系教授，亦或是当选万灵学院研究员，霍克思一直在金针度人。

在受聘牛津大学汉学系主任期间，霍克思积极推动汉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张汉学应该摆脱与宗教、政治和经济的瓜葛，以文学为研究与教学的基础，强调以学术为本位，秉持“人文主义”原则进行汉学研究，这些理念深深影响和激励着后世汉学家。他身体力行，主编“牛津东亚文学丛书”，先后主持出版了《李贺诗集》《陶潜诗集》《刘知远诸宫调》等多部中国典籍译本，提升了中国文学经典的海外认知度，也为推动中国文学系统性走出去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悉心培养和激励下，闵福德翻译了《聊斋志异》《易经》《道德经》等中华经典，黄兆杰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等研究专著，成为新一代中国文学“摆渡人”。

霍克思坚持译研并重，将研究融入翻译之中，不断调适翻译策略、修改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中译介中国文学、沟通中西文化。他认真对待中国文学中的每个字词、每个句子、每个表达，力求将其蕴藏的情感与意蕴完美地传递给世界读者。霍克思的成功源于其对中国文化真挚的爱，离不开其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更得益于其内心质朴的中国情结。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 何 强

茶马互市，又称茶马贸易，是我国历史上在边疆或边地开展的，内地农耕民族与西部、北部游牧民族之间进行的一种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互市双方交易的商品主要是茶叶和马匹，但又不限于茶叶和马匹，还包括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它起源于唐，发展于宋，盛行于明，终结于清，持续时间长达千年之久，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中央王朝进行边疆治理、巩固边防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国各民族跨越山河、双向奔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茶马互市的起源与演变

唐代是茶马互市的发端期。但唐王朝与西北各少数民族市马通常用绢，茶马互市只是一种零星的、不定期的贸易活动，并没有形成制度。宋朝建立初期，朝廷曾使用铜钱、布帛、茶叶等财物交易马匹。熙宁年间（1068—1077年），宋神宗采纳王韶的建议，在成都置茶场司，在熙州（今甘肃临洮）置买马司，从四川榷茶，运至熙河，折支马价，以茶易马，时称“卖茶博马”。茶场、买马二司的创设，是宋代茶马互市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使宋代的茶马互市从绢帛、铜钱、茶叶相兼的商品交换阶段，发展成为专门用茶易马的官营茶马互市时代。元丰四年（1081年），茶场、买马二司合并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元朝在成都设立榷茶机构，并在京兆（今陕西西安）、巩昌（今甘肃陇西）设局专卖。元朝统治者蒙古族以驯养马匹著称，加之辽阔的草原都在其统治之下，马匹充足，对茶马互市的重视程度不如前代。

明代是我国茶马互市的鼎盛时期。与前代相比，明代茶马互市机构健全，互市形式多样。为确保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明朝在“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建立了12个茶马司。同时，为了防止走私茶、马，明政府实行巡茶制度，定期派遣行人、御史等官到陕西、四川等地监督茶马贸易，巡禁私茶。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明廷将御史巡茶制度化，建立巡茶御史制度，专门由巡茶御史来综理我国西北地区茶马事务。此外，明政府通过

差发马互市、招番中马互市、朝贡互市等形式，使明代的茶马互市突破传统互市格局，出现空前繁荣景象。

清初，茶马互市沿袭明制。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了5个专管茶马互市的茶马司，同时，定期派出专管该地茶法、马政的茶马御史。随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战马的需求锐减，茶马互市逐渐走向衰落。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停止茶马互市。自此以后，在西北地区施行将近千年的茶马贸易宣告终结。

茶马互市的类型

以互市主体为分类依据，我国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可分为官市、民市和私市三类。

官市是一种由官府垄断的互市行为。唐宋以来，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上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军事上巩固国防安全的需要，基本上垄断了茶马互市。官市又可分为茶马司互市、招番中马互市、差发马互市和朝贡互市。

茶马司互市始于宋神宗时期，在此类型下，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互易是在茶马司主导下完成的。需要注意的是，从宣德十年（1435年）开始，明政府将商人资本引入茶马互市，茶商成为茶马司互市的重要参与者。

招番中马互市是茶马司互市的重要补充。从本质上说，茶马司互市是一种自愿贸易行为，但仅靠自愿互市难以满足军需，因此，朱元璋开始推行“招番中马”制度，派遣守将、使者等携带敕谕前往甘青藏族聚居区，令当地少数民族缴纳马匹，同时朝廷以茶叶作为回赏。显而易见，招番中马互市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差发马互市是建立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臣属关系基础上的一种互市行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间，明政府在陕甘边地推行金牌信符制度，每三年一次，派京官选调边军，持金牌信符前往洮州、河州、西宁等地附近的藏族聚居区，比对金牌字号，征收差发马匹，同时给予茶叶以示酬劳。金牌信符制度表面是一种实物税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以物易物

的互市活动。

朝贡互市是一种明代特有的茶马互市类型。明朝建立后，藏族聚居区的宗教领袖、地方首领纷纷入京朝觐，表示归顺明朝，明廷则根据他们各自的实际地位和影响等给予相应的封号、印诰，同时也给予他们丰厚的物品赏赐。在贡、赐物品中，马和茶是主体，此类型也成为藏族民众获取茶叶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藏族民众不仅通过朝贡互市以马易茶，而且借此表明对明朝的隶属关系。

民市产生于明代中期，是明代茶马互市市场化的产物。明弘治三年（1490年），明政府推行“招商中茶法”，由西宁、河州、洮州三茶马司招商，从产茶地收买茶斤运赴各茶马司。茶运到之后，官收40%，交各茶马司市马，其余60%由商人与边民自由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民市”。民市的出现，标志着民间茶马互市成为一种合法贸易行为，茶马互市不再为官市所垄断。

私市是一种与官市伴生的贸易行为。因茶马互市利润丰厚，商人、边民，甚至边防将吏、文武官员等通过各种办法，将私茶运往边地易马，参与茶马走私活动。在私市上，除以茶易马外，边疆各少数民族常以各种畜产品、麝香、藏红花等土特产换取内地的布匹、烟叶、食盐等。

茶马互市的历史作用

茶马互市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以茶易马活动，它是我国古代内地与边疆地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互通有无、交换生产和生活用品的贸易活动，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茶马互市是中央王朝进行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古代，茶叶和马匹都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唐宋以来，随着茶叶和茶文化的传播，茶叶逐渐成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对历代中央王朝来说，马既是出色的农耕畜力、交通运输工具，更是重要的国防战略资源。在此背景下，茶马互市逐渐成为中央王朝进行边疆治理、巩固边防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中央王朝通过

茶马互市获取战马，增强了国防力量，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提供了军事保障。另一方面，茶马互市是中央王朝加强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

茶马互市实现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生计互补。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工与互补是茶马互市产生的重要原因。反过来，茶马互市又带动了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的互动往来。在茶马互市的带动下，内地生产的茶叶、绸缎、布匹、盐、酒、铜器、铁器、瓷器、纸张、书籍等生产生活资料向西、向北流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牛、羊、皮毛、玉石、药材、黄金、佛像等也源源不断输入内地。此外，茶马互市还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交通的发展，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的开辟即是明证。如此种种，使我国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大一统经济区，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茶马互市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茶马互市不只是内地与边疆地区进行经济交往的重要载体，更是双方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桥梁。一是通过茶马互市推动了典籍文化的传播。《诗》《春秋》《礼记》《尚书》等儒家典籍及各种医学典籍伴随茶马互市传入青藏高原地区、蒙古高原地区，对当地的礼乐文化和医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药文化也传入内地，藏医、蒙医的传入即是明证。二是文化习俗的双向传播。茶马互市兴起后，茶商将内地的信仰、文化习俗等传播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时，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信仰与文化带回内地或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三是饮茶文化的相互交融。在茶马互市过程中，内地茶文化传播、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生活中，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饮茶文化，如藏族酥油茶文化、蒙古族奶茶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的三种新样态

□ 陈 甜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随着时代环境变迁，形式变化多样，表现出变动不居的特点，其本质决定其不会在短期间内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表现方式上由显性直白向迂回隐性转变、议题设置上更加“学术化”，必须注意新的时代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动向、新样态。

借助互联网输出，以网络化样态示人。1994年我国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正式接轨，30多年来我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信息时代的“追随者”到“引领者”，向着网络强国阔步迈进。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近11亿人。然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让历史虚无主义“发现”了新的渗透领域和散播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便与互联网结合，通过设置不良舆论议题、变换舆论传播形式散播错误史观、错误史实。201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愈发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场域，历史虚无主义渗透领域也随之发生转移，在社交软件、直播平台、游戏类APP中散播错误历史信息，诱导不明真相的群众陷入历史谬论中。

近年来网络上带节奏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否定中国近代以来进步革命历史、抹黑英雄人物等现象明显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已经退场，而是隐匿于互联网营造的空间、渠道中，以隐蔽性表现、碎片化叙事和日常化渗透等网络化新样

态展开渗透，历史虚无主义隐性化趋向增强。例如，某微博博主将账号名设置为731，用英文字母I取代1，企图用“去意识形态化”诱导人们忘却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惨无人道的残害行径。历史虚无主义网络化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特征，样态不时翻新，亟须实时关注。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智能化样态渗透。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传播领域的颠覆性变化，标志着智能传播时代的全面到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时代环境、社会条件相互作用下，历史虚无主义与人工智能技术耦合，改头换面、潜滋暗长，呈现出智能化新样态。

在信息生产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智能生成内容技术，以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建构模型训练，批量化生产夹杂着错误史观、错误史实的历史虚无主义内容。在信息发布上，利用深度伪造和虚拟化技术，打造“机器人水军”，用虚假账号有组织、有目的地参与评论、转发和点赞含有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内容。在信息散播上，借助推荐算法，对网络用户“画像”，根据用户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智能分发暗含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长期诱导受众“重新解读”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不限于以上所列举的几种技术，有些技术还存在交叉性运用。例如，将智能生成内容技术与深度伪造

技术相结合，批量化生产篡改历史文本、伪造历史影像的错误信息。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历史虚无主义在信息生产、发布与传播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滋长空间，隐匿性、欺骗性进一步加剧，潜藏着扩散、蔓延的风险。随着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将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同时也会给历史虚无主义制造新的蔓延条件和空间，这种趋势需要高度警惕。

假借学术研究之名，以“学术化”样态散播。以学术研究、学术反思为名，颠覆史观、歪曲史实，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惯用的手法。一些史学著作以及前几年盛行的以回忆录、口述资料、个人传记为史料颠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均可见其学术蔓延路径。借助“学术化”蔓延的历史虚无主义，运用唯心史观架设起看似高深的学理外衣，再利用带有错误政治立场和方法论失范的偏颇史料展开佐证，容易给人留下“条分缕析”“旁引曲证”的印象，若不细加分析，看不出含有多少意识形态的成分。对于历史专业人士来讲，历史虚无主义提出的所谓理论观点和运用的所谓史料，经不起学理上的半点推敲和考证，但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受众而言却具有较强的迷惑性。

由于历史虚无主义以“学术化”样态示人，容易混淆视听、逃避监管，从而成为历史虚无主义主要的渗

透方式之一。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学术化”最新样态突出表现为“新清史”错误观点的蔓延、传播。“新清史”否定清朝历史时期满、蒙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统一，割裂清朝与中国历史上汉王朝的联系，把长城以南地区称为“中国本土”，妄称清朝不等于中国，把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与西方殖民行为混为一谈。这些观点显然与清朝历史毫不相符，是对清朝历史的虚无化。近年“新清史”谬论又有新的发展，从陆地蔓延至海洋，提出所谓清朝对海上疆域的治理和防御也是侵略扩张，清朝是“陆海兼优”的“双重帝国”的错误观点。这与清朝海防力量与抑制商业发展的真实历史南辕北辙。此外，国外举办的一些关于中国清代历史的展览、出版的一些书籍，同样深受“新清史”谬论影响，隐含着对清朝历史的错误解读，严重曲解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掩盖或粉饰了帝国主义侵华历史。“新清史”这些错误历史观点及其传播，助长着历史虚无主义“学术化”蔓延趋势，广大学者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要旗帜鲜明与之斗争，立足唯物史观向读者还原真实客观的历史原貌。

